

# 北宋乡兵述论

强文学

(天水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甘肃天水 741001)

**摘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北宋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长期奉行“守内虚外”的消极战略。因为边防线过于绵长,禁军的数量远不能满足需要。为了有效地防御辽和西夏,以及对付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部族的袭扰,北宋政府在边境地区征募了大量乡兵协助禁军戍守和作战,特别在西北的宋夏边境和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乡兵逐渐成为巩固边防和维持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军事中坚力量。

**关键词:**北宋;乡兵;蕃兵;边防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020(2009)01-053-04

北宋兵制,军队分为三种:禁军、厢军和乡兵。禁军和厢军是国家的正规军,属于募兵,乡兵则是地方民兵部队。北宋中后期出现的蕃兵,是少数民族乡兵。北宋的乡兵分为征籍制和招募制两种。征籍制乡兵是汉唐时期“寓兵于农”的义务兵役制在某种程度上的恢复,带有强制性服役的特点,招募制乡兵属募兵的范畴,但其招募形式及各种制度又和募兵大不相同,他们基本上是一种半职业化的军队,仍未脱离农业生产。北宋乡兵的部署地域,主要集中在北方宋辽边境的河北二路、西北宋夏边境的陕西诸路与河东路,以及中央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西南地区。北宋中后期,乡兵的军事地位逐步上升,是北宋政府巩固边防和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一支重要力量。

## 一、北宋前期的乡兵

唐代中期以后,均田制瓦解,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也随之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唐末五代,中央集权衰微,藩镇割据局面长期存在。在这一时期,募兵是军队的主要来源。晚唐五代中央政府、各藩镇及地方割据政权,出于争权夺利的需要,都倾其全力招募军队。然而,长期频繁的战乱使得各地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其所能提供的赋税收入十分有限,远不能满足维持一支数量庞大的募兵队伍的军费需求。另一方面,战祸所导致的人口大量流移和伤亡,使得可招募的兵源也日益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对征兵制在某种程度上的恢复,乡兵开始出现。唐末及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繁,强征乡兵的情况经常出现。<sup>①</sup>后周广顺年间(951—954年),西北地区的秦州(治在今甘肃天水市)有保毅乡兵(亦称保毅弓箭手),河北镇州(治在今河北正定县)有弓箭手,瀛州(治在今河北河间县)、霸州(治在今河北霸县)等地有强壮。后周所置乡兵,数量很小,在军事上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北宋立国之初,因袭后周遗制,保留了乡兵在边地的设置,又有所增补。北宋乡兵的设置和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北宋前期的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这一时期乡兵的规

模较小,地位较低,其作用也十分有限。第二个阶段是在北宋中后期,自仁宗朝始,至北宋末,乡兵大量增置,其数量和分布范围空前扩大,乡兵在国家军事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得到很大提高。

宋初太祖时,后周所置保毅、强壮、弓箭手等乡兵大都被保留下来。其后,在太宗和真宗两朝,北方宋辽战争不时爆发,西北党项首领李继迁又起兵反宋,北宋承受的军事防御压力很大。为加强边防力量,北宋在这些地区又陆续增补和创设了不少乡兵。在宋辽边境的河北二路与河东路,除原有的强壮乡兵得到增补外,还设置了神锐、忠勇、忠顺、强人、义勇等乡兵,在西北与夏国政权毗邻的陕西诸路与河东路,原有的保毅乡兵得以扩大规模,又增设了义勇、弓箭手、强人、强人弓手、寨户、义兵等乡兵。在南方地区,主要是西南地区,也陆续设置了一些乡兵。川蜀诸路有义军、土丁、壮丁,荆湖南北路有弩手、土丁,广东、广西、福建路有枪仗手、土丁、壮丁、峒丁等。

北宋前期各种名目的乡兵,大多数规模都比较小,一般在几千人左右。数量最大的是强壮和保毅乡兵。北宋前期的强壮乡兵的数量史无记载,但根据宋仁宗康定初统计的数字及当时的征籍方式,宋真宗时,河北、河东地区的强壮数量当不下20万人。<sup>②</sup>陕西的保毅乡兵在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时,人数最多,达到68775人。<sup>③</sup>北宋前期乡兵,其征募之制不甚完善,在编制、训练、给赐及戍防制度上也没有严格的规定,乡兵的作用只在于本地防拓,军事意义不大。这是因为,北宋早期,禁军战斗力尚强,无须突出乡兵的地位。边境爆发战争之时,乡兵亦止令城守。宋初三朝,乡兵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仅有河北强壮一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五月,朝臣奏请在河北沿边使用“强壮备城”,<sup>④</sup>咸平六年五月乙卯,以弥补禁军守御之缺。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契丹大兵入寇,宰相寇准奏请“募强壮入敌境,焚毁族帐,讨荡生聚”。<sup>⑤</sup>朝廷从其议,诏“河北吏民有集强壮杀契丹者,令所在援之,仍颁赏格”。<sup>⑥</sup>同年十月,契丹攻瀛

收稿日期:2008-08-29

作者简介:强文学(1976—),男,甘肃靖远人,讲师。研究方向:宋史、清代货币史。

州城 瀛州知州李延渥“率州兵、强壮，又集贝冀巡检史普所部拒守”，契丹军攻城数十日不能下。<sup>[7]</sup>在这次战斗中，强壮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得到了朝廷的赏赐。宋辽澶渊之盟订立后，“放强壮归农”。<sup>[8]</sup>此后，北宋的北方边境出现了相对和平的局面，乡兵的措置开始寝废。到仁宗初期，“神锐、忠勇、强壮久废，忠顺、保毅仅有存者”。<sup>[9]</sup>

## 二、北宋中后期的乡兵

宋仁宗统治时期，北宋的边防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西北，元昊称帝之后，宋夏战争爆发。在西南，少数民族部族的叛乱事件与日俱增。北方辽的巨大威胁也仍然存在。而此时的北宋王朝，在与辽议和后三十余年时间里，国家承平日久，专以粉饰太平为务，“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sup>[10]</sup>面对严峻的局势，朝中上下皆“茫然不知所措”。<sup>[11]</sup>宋夏战争之初，北宋西北沿边虽屯有重兵，但“可战之士，十无二三”，<sup>[12]</sup>因而战争中败亡相继，损失惨重。朝廷派往西南讨伐叛乱的军队，也大都折戟而归。范仲淹等人到西北主持军务后，鉴于禁军战斗力低下，且兵力分散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了防御策略，在西北边地兴筑堡垒，大量措置乡兵，以增强防御能力，取得了较大成果。北宋西北边防的不利局面逐渐有所改观。在这种情况下，乡兵在边防中的重大意义始为北宋朝廷所认识，政府开始在沿边诸路及西南地区大量设置乡兵，并一直持续到北宋后期。

北宋中后期增置的乡兵，从数量上看，征籍制乡兵所占比例最大。在北方和西北地区，主要有义勇和保甲。仁宗庆历初，从河北、河东强壮及民户中挑选义勇，其中河北二路得 189031 人，河东路得 77079 人。<sup>[13]</sup>英宗治平元年(1064 年)，陕西路亦征籍义勇，得 156873 人。<sup>[14]</sup>以此推算，英宗时，义勇乡兵的总数达到 42 万多人，其规模已相当庞大。神宗熙宁年间，保甲法行，义勇的数量有所下降，熙宁九年(1076 年)，河北、河东、陕西路义勇总数为 247537 人。<sup>[15]</sup>但此时作为乡兵的教阅保甲却迅速发展起来。熙宁九年(1076 年)，河北、河东、陕西及开封府界的教阅保甲总数已达到 570825 人。<sup>[16]</sup>神宗元丰四年(1081 年)以后，义勇亦归入保甲，此时北方沿边诸路及开封府界的保甲乡兵总数在六七十万左右。神宗时，朝廷对保甲乡兵的寄望很高，但收效甚微。这也导致了神宗以后北方乡兵征籍制度日益破产。而大量的招募制乡兵，自仁宗时起，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弓箭手和蕃兵，其数量虽不如义勇和保甲庞大，但对于北宋西北边防来说，所起作用非常重大。直到北宋末，弓箭手和蕃兵都一直得以存置，并且始终都是北宋防御西夏和经制西北吐蕃的两支劲旅。

北宋中后期，南方地区也增置了大量乡兵。尤其在西南地区，随着北宋中后期的几次“开边”活动，北宋政府为了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征籍大批少数民族壮勇为乡兵，配合禁军镇御各地。一方面，北宋由于北方的军事压力太大，抽不出太多的禁军部队驻守这些地区。另一方面，西南地区地形复杂、山林险恶，又多瘴疠，北方士兵不服水土，经常发生“禁军往戍南方，多死”的情况。<sup>[17]</sup>而用乡兵，则可有效地解决上述难题。北宋在西南地区所增设的乡兵，主要包括义军、土丁和峒丁，它们都是属于征籍制一类的。其规模

也相当可观，如荆湖路义军和土丁，仁宗庆历二年(1042 年)，北路有 19400 人，南路有 5158 人。<sup>[18]</sup>广西路峒丁，英宗治平二年(1065 年)初置时已达 44500 人，<sup>[19]</sup>其后峒丁的数量还有增加，总数经常在十万人左右。

## 三、北宋乡兵的作用

北宋政府设置乡兵，究其初衷，是要用来补充沿边正规军兵力之不足，配合正规军戍守和作战。北宋的大多数征籍制乡兵，居住分散，平时训练不足，其战斗力十分低下，要用于出征作战是很困难的。因而这部分乡兵在遇边警之时，只招集防守城镇和村落，一般不会随正规军外出参加战斗。北宋前期的一些征籍制乡兵，如神锐、忠勇、强壮等，都属于这种情况。他们平时务农，寇至则“悉集守城”。<sup>[20]</sup>而同期的保毅和忠顺乡兵比较例外，他们有比较固定的番戍制度，长年驻守在边境地区，担负一定的戍防任务。真宗咸平初，秦州边地置保毅千人，使“分番戍守，月给米，冬赐衣”。<sup>[21]</sup>咸平五年(1002 年)，陕西诸路增置保毅，“给资粮，与正兵同戍边郡”。<sup>[22]</sup>太宗时，于河北宋辽边境的瀛州军、莫州军(治在今河北任丘市)、雄州军(治在今河北雄县)、霸州军和乾宁军(治在今河北青县)、顺安军(治在今河北高阳县东)、保定军(治在今河北霸县南)置忠顺，“沿界河分番巡徼，隶缘边战棹巡寨司。自十月悉上，人给粮二升，至二月轮半营农”。<sup>[23]</sup>

北宋中后期的征籍制乡兵，如义勇、保甲，数量庞大，朝廷寄望甚高，有了逐步比较明确的番戍制度。以义勇为例，英宗治平初，义勇的戍防仅限于本地，遇召集防守，“日给米二升，月给酱菜钱三百”。<sup>[24]</sup>至神宗熙宁初，王安石以义勇训练日久，欲使渐次分番出戍。时经原路经略使蔡挺令本处义勇与正兵相参战守，“给官马，月廩、时帛、郊赏与正兵同”。<sup>[25]</sup>蔡挺制义勇番戍法上奏朝廷，规定“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十月罢，防春以正月十五日上，三月罢，周而复始”。<sup>[26]</sup>各路将义勇分定番次，每番 3000 人，轮流出戍。朝廷从其所请，推行于诸路。熙宁三年(1070 年)，又将陕西义勇按“缘边”和“近里”分为七路。缘边州军义勇于秋冬上番屯戍，缘边禁军不足时，即量数抽调近里州军义勇代戍。义勇赴边，须自备一月口食，国家相应地折免其部分税赋，不能自备的，可向当地的官府预借。但在历次宋夏战争中，义勇所能发挥的军事作用十分有限。

自保甲法推行以后，保甲逐渐成为北方征籍制乡兵唯一的兵种，也是北宋历朝乡兵中数量最大的一支。对于保甲的选籍、编制和训练，神宗时给予极高的重视。但保甲施于征防，史籍记载很少。保甲虽数量众多，但训练不足，且朝廷内部意见不一，从熙宁至元丰初，各路保甲只于本地巡逻捕盗，未能用于征戍。直至元丰六年(1083 年)，朝廷才决定在边事紧急时调用保甲战守。同年九月七日，诏“诸路经略安抚、转运司要急差用保甲，牒提举司随色应副。战守防托，差武艺高强及第一等者，役使差以次人”。<sup>[27]</sup>然而保甲在此后的表现却令朝廷失望。元丰七年(1084 年)七月，知延州刘昌祚言：“昨集教保甲弓马并不精当，但令守御。”<sup>[28]</sup>同年八月，始令保甲出戍外地，“河东、陕西发保甲，给路费出州界。二百里以上，保正三千，副保正二千，保长一千，小保长、保丁七百，不满二百里，及沿边不出本州界二百里以上，保正二千，副保正千五百，保长七百，小保长、保丁五

百”。<sup>[29]</sup>神宗以后,变法废弛,保甲的教阅陷于停顿,其征戍更加无法施行。哲宗亲政后,章惇等人为相,借绍述之名,又恢复了保甲的教阅,可是在推行过程中困难阻力重重。至徽宗朝,保甲的征籍、教阅更加流于形式。哲宗、徽宗两朝,保甲已无征戍可言。“法行既久,州县玩习弛废,保丁开收既不以实,保长役使又不以时。如修鼓铺、饰粉壁、守败船、治道路、给夫役、催税赋之类,科率骚扰不一,遂使寇贼奇邪无复纠察,良法美意浸成虚文。”<sup>[30]</sup>徽宗末年,金兵南下入侵,西北地区的禁军多调往京畿、河北,而陕西、河东边防空虚,“全藉保甲守御”。<sup>[31]</sup>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逼近开封,禁军经过几次大战,伤亡惨重,已无力抵御,朝廷匆忙以尚书户部侍郎钱盖为龙图学士、陕西五路制置使,“专一措置京兆府保甲”。<sup>[32]</sup>同年六月,以京畿提刑秦元训练开封府界保甲。开封被围以后,秦元请求训练保甲“乘间出战”,<sup>[33]</sup>但为时已晚。北宋覆灭后,保甲亦随之消亡。

招募制乡兵在数量上虽不如征籍制乡兵多,但其战斗力却很强。特别是西北地区的招募制乡兵,像弓箭手、蕃兵、勇敢效用等,他们身处边地,编制严密,和正规军交错驻屯。平时负责本地警备,有战争发生,则配合正规军捍御城寨,甚至出征作战。

弓箭手是招募制乡兵中部署最久、分布最广、作用最大的一种。早在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曹玮在镇戎军(治在今宁夏固原)所招募的弓箭手即“参正兵为前锋”。<sup>[34]</sup>其后,陕西、河东路相继大量募置。到了神宗时,弓箭手置屯列堡及征戍之制趋于完备。政府于弓箭手耕垦之处据险修筑寨堡,“以备寇至,寇退则悉出掩击”。<sup>[35]</sup>这在防御夏人的小规模侵扰中很有成效。在西夏大军入侵时,弓箭手悉集于各大城寨守御。西北边境在缺少正规军的时候,弓箭手就成了一支不可或缺的防御力量,以至于在北宋中后期,陕西诸路更是“恃弓箭手为国藩篱”。<sup>[36]</sup>

蕃兵是招募制乡兵中战斗力较强的兵种之一。平日以驰逐射猎为务,天性勇悍,不畏寒暑。北宋初期,西北边地的蕃部即被用以防范党项李氏政权。朝廷对这些部族的首领“命之戎狄,赐以官俸,量其材力功绩,世相承袭”,使其“绥怀族帐,谨固疆界,器械粮粮无烦公上”。<sup>[37]</sup>太祖时,河东路的麟、府、丰三州均为边防重地,境内又以蕃族为多,朝廷分别以各州蕃族首领为知州,准其世袭,如麟州杨氏、府州折氏、丰州王氏。其中府州折氏自北宋初的折德晟至北宋末的折可大,历十二任知州,而北宋在西北对付党项政权的过程中,所获其力颇多。史载折氏“独居府州,控扼西北,中国赖之”。<sup>[38]</sup>仁宗时,西夏政权勃兴,朝廷更加重视对沿边蕃部的招抚和利用,以达到“联蕃制夏”之目的。仁宗时,“募首领愿效用者,籍姓名并土马之数,及千人,所自推有谋勇者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检之名,使将领出境,破荡生户,所获财畜,官勿检覆。得首级及伤者给以赏物,仍依本族职名补迁及增俸钱”。<sup>[39]</sup>庆历二年(1042年),种世衡在青涧城正式募置蕃兵后,蕃兵开始兴盛。神宗时制定蕃兵法,蕃兵遂自成一军。各部蕃兵由蕃官首领统率,蕃官又听命于北宋沿边将官。蕃兵“恋土田,护老弱、牛羊,遇贼力战”。<sup>[40]</sup>神宗时,赵离在延州招募的蕃兵人马,“因训练以时,精锐过于正兵”。<sup>[41]</sup>蕃兵平时藩蔽边境,遇警则调发出征,在战斗中常被用作先锋。“临敌之际,须至首用蕃兵,次用汉兵继之。庶气势相临,虽遇坚敌,亦无退却之患”。<sup>[42]</sup>

元丰六年(1083年)八月以后,蕃兵逐步向正规军的方向发展,成为北宋西北边防的中坚力量。

北宋北方地区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招募制乡兵,其军事意义不是很大。其中的一些因为数量较少,不能单独成军,往往依附正规军驻扎和训练,在战斗中多担负一些守卫任务,如寨户、护寨、强人弓手、义兵等。还有一些则主要属于保境安民性质,或担负向导、刺探敌情等特殊任务。如河北的弓箭社,“平日保境,备御小寇”。<sup>[43]</sup>再如河北强人,“无事散处田野,遇敌入寇追集,给器甲、口粮、食钱,遣出塞偷歼贼垒。能斩首级、夺马者如赏格,掳获财畜皆畀之”。<sup>[44]</sup>陕西所募强人则“番戍为巡徼斥堠”。<sup>[45]</sup>

西南地区的乡兵,基本上属于征籍制一类。在北宋政府的羁縻政策之下,主要用来镇抚当地少数民族。仁宗时,西南许多少数民族部族叛乱频仍,政府派往征讨的禁军部队,由于不习水土,因染疾病而死的甚多。朝廷遂在讨叛时大量征发本地土人为乡兵,随同正规军作战。他们既当向导,又作官军的前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益州(治在今四川成都市)知州田况言清井监(治在今四川珙县境内)夷人作乱,官府就征发大批“白茆子弟”和驻军一起前往征讨。<sup>[46]</sup>神宗及以后各朝,为了彻底制服西南各地的少数民族,北宋政府在这些地区开始推行“开边”和汉化政策,以期建立直接统治。这势必引起各民族的激烈反抗,朝廷在西南地区的军事行动也日益增多。这一过程中,乡兵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西南地区的乡兵“分隶边寨,习山川道路,遇蛮入寇,遣使袭讨,官军但据险策应之”。<sup>[47]</sup>终宋一代,西南地区历次少数民族叛乱的平定,几乎都借助于乡兵。此外,北宋西南边境与大理、交趾、吐蕃诸部毗邻地区的峒丁、义军、蕃兵等乡兵,由于缺少正规军驻防边地,这些乡兵“施之西南,实代王师,有御侮之备,无饷餉之劳”。<sup>[48]</sup>是重要的边防力量。

纵观北宋历史,有着“兵农合一”特点的乡兵和募兵制下的禁军、厢军始终并存,在军事上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对于北宋历史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北宋乡兵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北宋各朝在北方和西北地区所置的大部分征籍制乡兵,数量虽十分庞大,但在北宋防御辽、夏的军事斗争中几乎没有发挥出任何实效。北宋乡兵中真正重要的两个部分,一是西北地区设置的以弓箭手和蕃兵为主的招募制乡兵;二是西南地区的乡兵,主要是少数民族乡兵。他们是北宋中后期对付西夏和加强在西南民族地区统治的军事中坚力量,对北宋中后期边境地区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 参考文献:

- [1]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9][13][14][15][17][20][22][24][25][26][30][31][33][38][40][41][43][48]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卷190《兵志》四,卷190《兵志》四,卷191《兵志》五,卷191《兵志》五,卷191《兵志》五,卷191《兵志》五,卷190《兵志》四,卷190《兵志》四,卷191《兵志》五,卷191《兵志》五,卷191《兵志》五,卷192《兵志》六,卷193《兵志》七,卷192《兵志》六,卷253《折衷德传》五,卷191《兵志》五,卷332《赵离传》,卷190《兵志》四,卷191《兵志》五.



[3][16][27][28][29][32][46]徐松.宋会要辑稿[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

[4][5][6][7][8][10][11][12][4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0. 卷 54 ,卷 57 ,卷 57 ,卷 58 ,卷 58 ,卷 204 卷 204 ,卷 146 ,卷 338.

[18][19][21][23][34][35][36][39][44][45][47]马端临.文献通

考[M].台北: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影印本,1983.卷 156《兵考》八,卷 156《兵考》八,卷 156《兵考》八,卷 156《兵考》八,卷 156《兵考》八,卷 156《兵考》八,卷 156《兵考》八,卷 156《兵考》八,卷 156《兵考》八,卷 156《兵考》八.

[37]曾公亮.武经总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本,1987.前集,卷 18 上.

A survey of North–song Dynasty Militia

QIANG Wen-xue

(College of Lirterature History ,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Tianshui Gansu 741001)

**Abstract** In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the North–song Dynasty was the one which deteriorated to be poor and weak. It carried out the negative defending strategy of ‘strongly inside,weakly outside’. Because of its too prolonged frontier, the quantity of its imperial guard is far from being able to meet their needs. In order to fight against Liao Dynasty and Xixia as well as cope with the harassment from the minority tribes in south–western region, the North–song Dynasty goverment recruited the massive local militias in the border area to assist the imperial guards. Especially in the Northwest border between North–song Dynasty and Xixia as well as area of the south–west minority, the local militia gradually became into the decisive power to consolidate the border and to maintain the rule in national minority area.

**Key words** The North–song Dynasty; The Militia; minority force; frontier defence

责任编辑 :何启明

(上接第 36 页)以及前字为阳平、后字为各种调类的“重轻型”变调,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变调在“阳平+去声”这一组合上发生重叠,即从调式上看,“墙上 13–21 44、留下 13–21 44”,既可以看作是“重重型”变调,也可以看作是“重轻型”变调,我们同样从系统的角度考虑把它划归到“重轻型”变调中。

4.3 阴平字的轻声化

康乐方言轻声的另一个特点是“阴平字的轻声化”。如前文所述,阴平字作后字时常读轻声,即使在一些非口语常用词中,也读得又轻又短。因此康乐方言中,以阴平为后字的轻声词语要比以其他声调作后字的词语多,也比北京话等许多

方言以阴平为后字的轻声词语多。联系到“重重型”变调多发生在前字为阴平的组合中,且变调结果都是前字变为 21,可以说,调域低、调长短是康乐方言阴平字在连调中的总特征。

4.4 上声的变调

康乐话中两上声字相连,部分词语前字变调,由 53 变为 21,其他词语不变调。变调的条件与是否凝固常用有关。这说明康乐话中“上上”变调还不够成熟,处于扩散阶段。

参考文献:

[1] 魏钢强. 调值的轻声和调类的轻声[J].方言,2000 (1).

Disyllabic Tone Sandhi in Kangle Dialect as a Three–Tones Dialect, Gansu Province

DENG Wen-j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 Kangle dialect is a three–tones dialect, this paper describes its disyllabic tone sandhi, and discusses its sandhi rules and neutral tones’ nature.

**Key words:** Kangle dialect; three–tones dialect; disyllabic tone sandhi; nature of neutral tones

责任编辑 :莫 超